党史研究丛书

四川革命烈士传

第六辑

SI CHUAN
GE MING
LIE SHIZHUAN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川党史研究丛书·

四川革命烈士传

第六辑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党史人物传编辑组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1250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八· 成都

1081250

封面题字：张秀熟
责任编辑：陈文渊
封面设计：张复祥

四川革命烈士传　第六辑　（四川党史研究丛书）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党史人物传编辑组　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省灌县印刷厂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开本　　印张4　　字数100千
1986年8月第一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3，800册
书号：11316·46　　定价：0.85元

China



袁诗荛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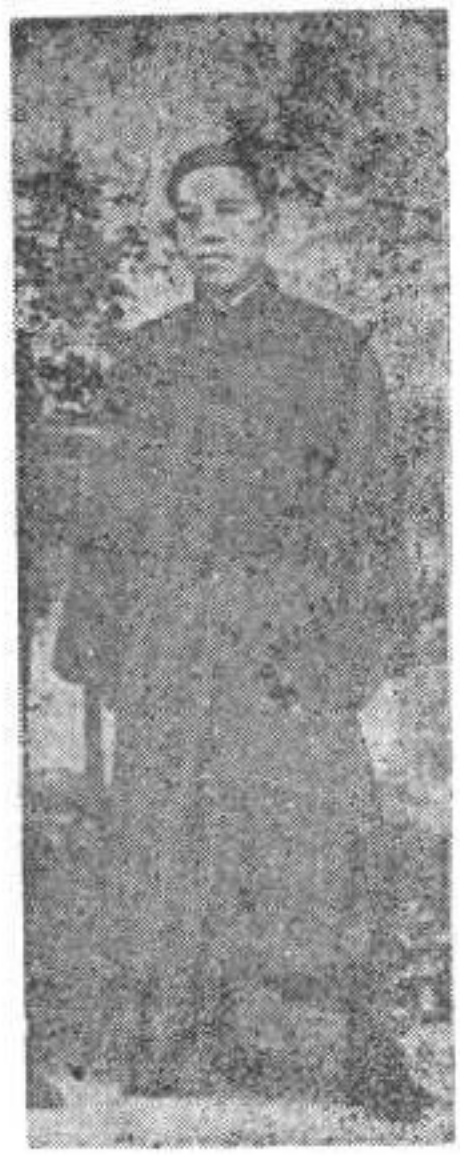
龚堪慎烈士



周尚明烈士



张博诗烈士



钱芳祥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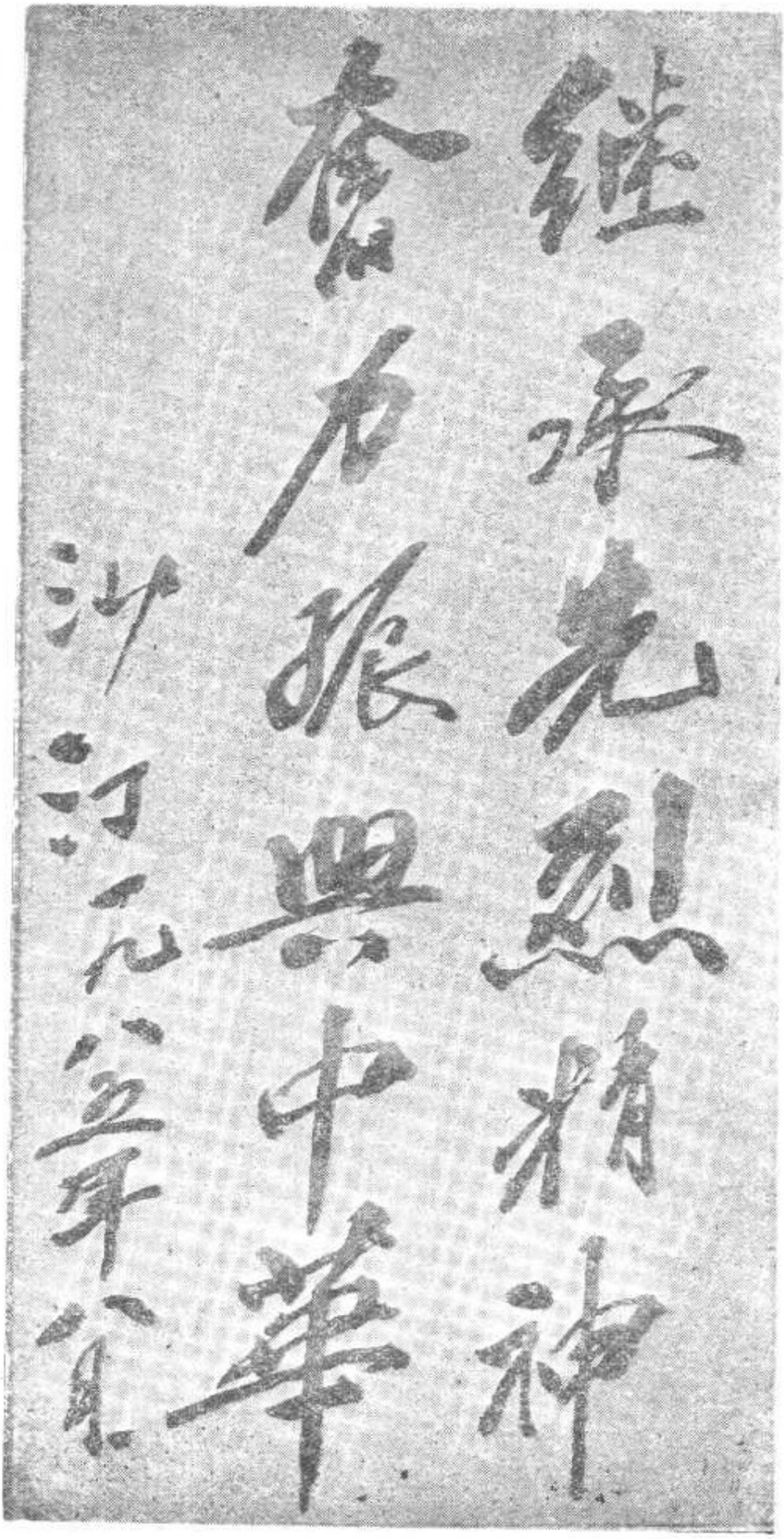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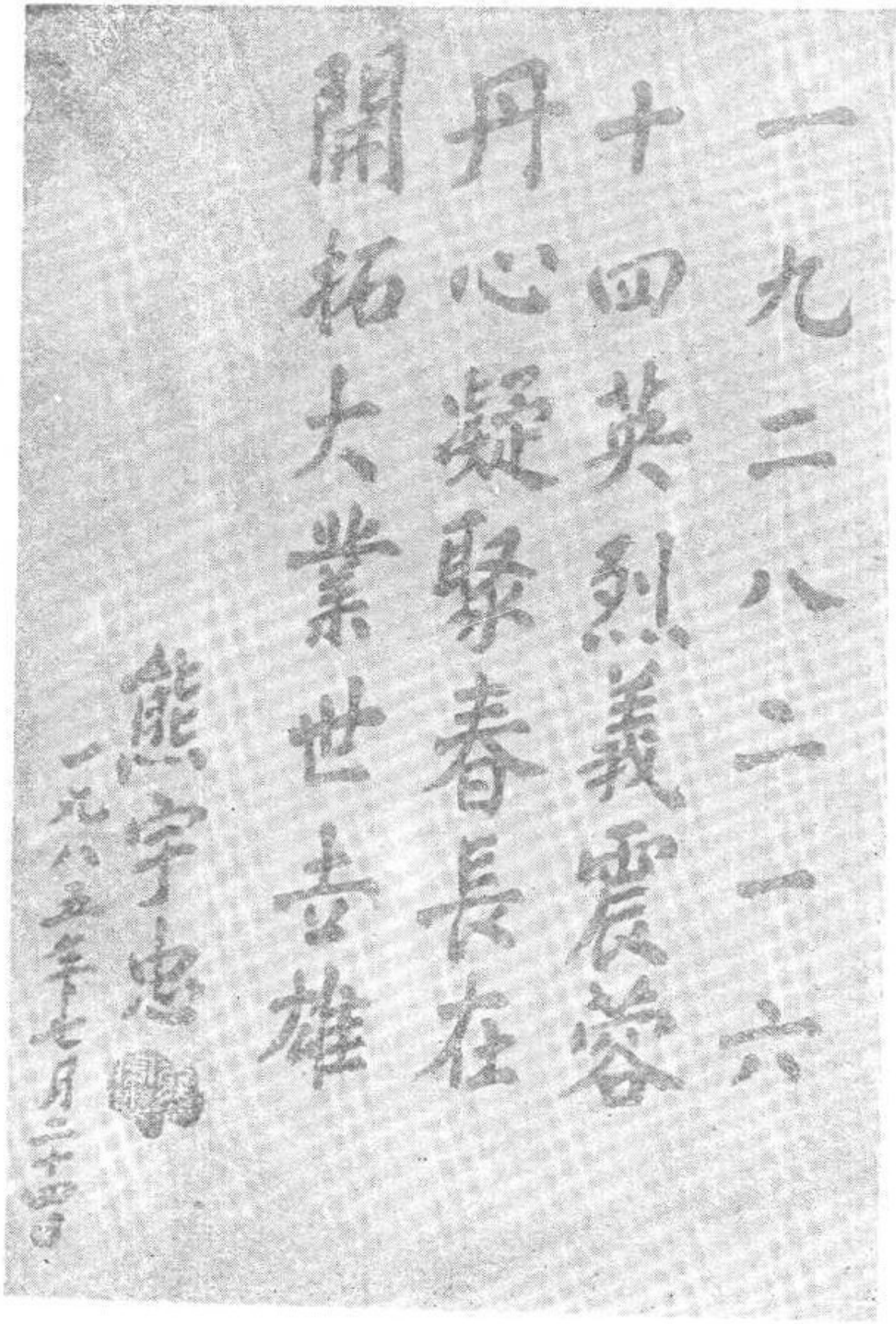
韩钟霖烈士（画像）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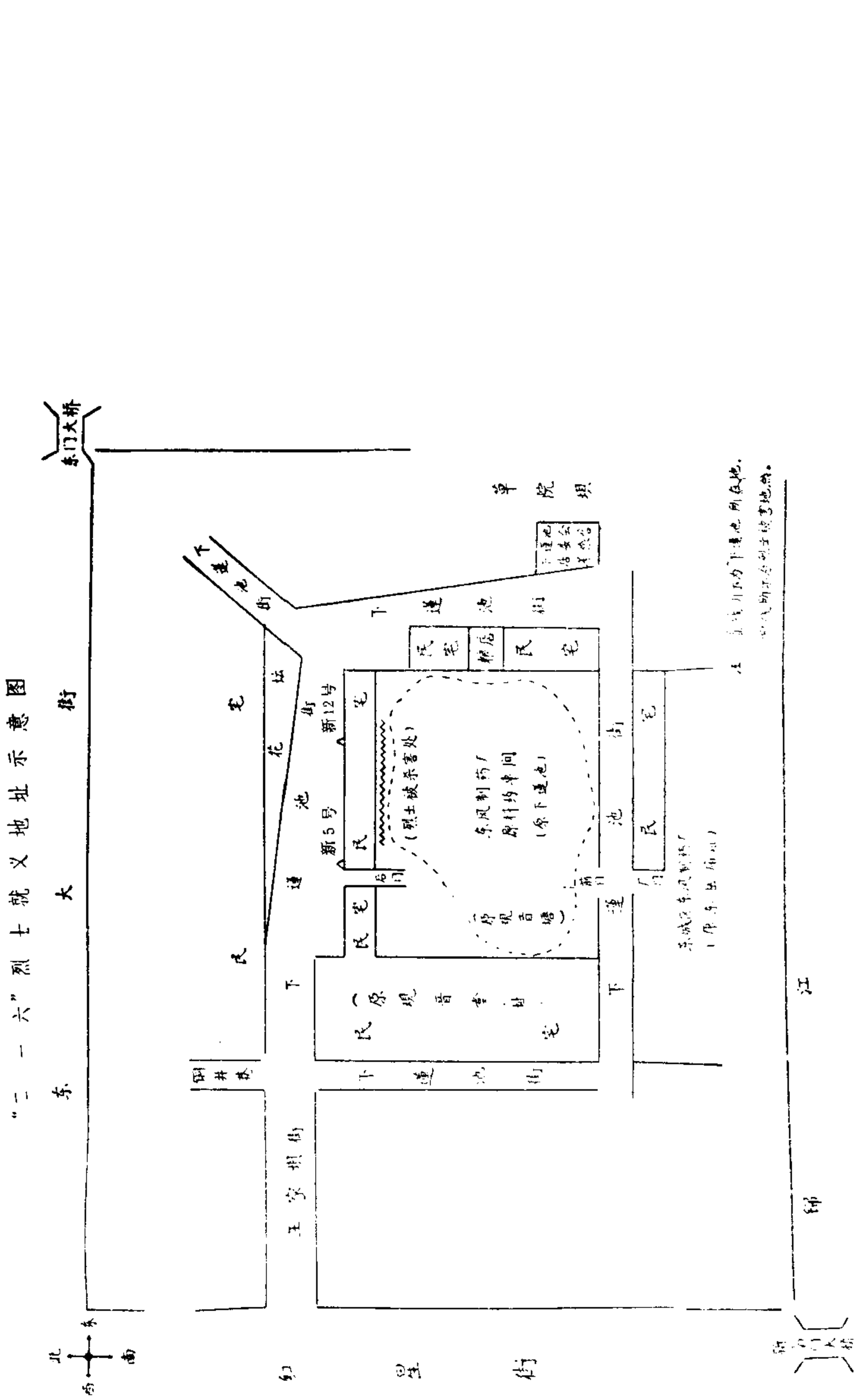
成都1926年"二六惨案"是帝
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三三惨案"以后
又一大惨案。先烈们向自己的
人民控诉暴行，而法官就以
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惨遭杀害。
烈士们受到了人民的崇拜和尊敬，
永垂不朽！

沈雁冰 一九八五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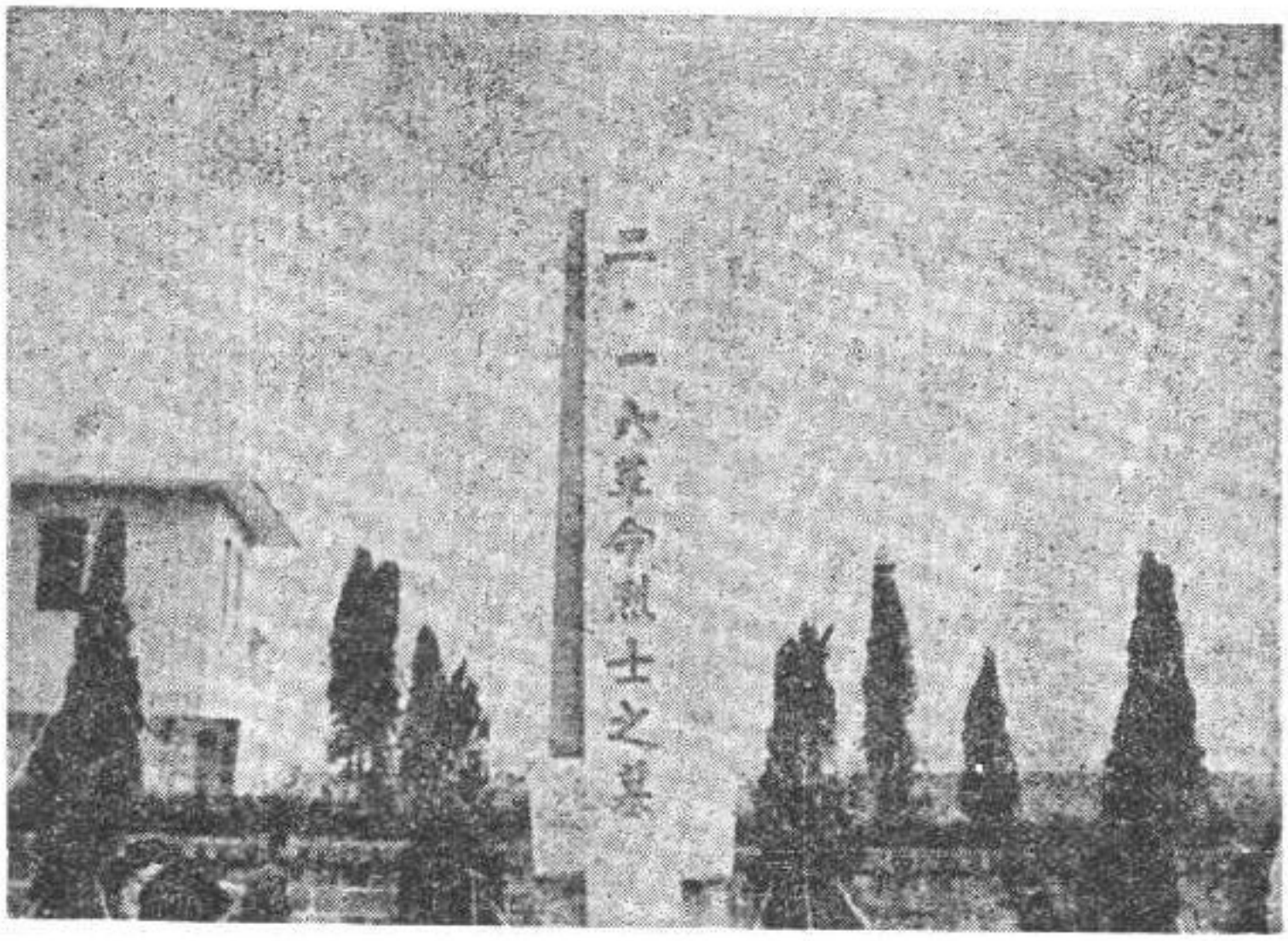

在
春
花
無
中
精
神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開丹十
熊宇忠
大疑英烈義震谷
業世志雄
耘心四
駿春長在

"二一六"烈士就义地址示意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成都外北磨盘山的“二·一六”烈士墓

编审委员会： 杨　超　任白戈　张秀熟　安法孝

周　颐　陈　文　彭　塞　郝　谦

编　辑　组： 乔毅民（组　长）　　张迪民（副组长）

毕　兴　阚孔璧　邓寿明

“二·一六”惨案始末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二·一六”烈士传》编写组　秦继光执笔

（一）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凌晨，成都“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向育仁派出大批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当时旧皇城内的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和五世同堂街的公立四川大学法政学院①、爵版街的志诚法专、盐道街的省立第一师范。他们蔑视教育尊严，蹂躏人身自由，按照事先拟定的黑名单非法逮捕了师大附中教务主任袁诗荛及各校学生一百余人。当天下午，既没有进行审讯，也没有任何证据，就将师大附中教务主任袁诗荛和成大学生李正恩、钱芳祥、王向忠、王道文、胡景瑗、韩钟霖，师大学生张博诗、公立四川大学法政学院（以下简称“川大”法政学院）学生龚堪慎②、志诚法专学生郭翼棠③、省立一师学生周尚明、石邦榘、陈选、白贞瑞等十四人枪杀于下莲池。

烈士们在就义前，临危不惧，正气浩然。当敌执法官宣布：“你们是共产党，现奉三军长命令，立即予以处决”时，袁诗荛高声质问道：“你们指我等为共产党，有何证据？你们无故扣押我们，是何道理？应当明白宣布！”王道文在反对敌人捆绑时奋力搏斗，并怒斥敌人道：“我们犯了什么罪！”在被押赴刑场时，他们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旁观群众，莫不动容。

烈士们牺牲后，在成大校长张澜主持下，将成大六位烈士分棺合葬于外南武侯祠侧。以后张博诗烈士遗体亦迁此合葬。袁诗荛（盐亭）、龚堪慎（宣汉）、石邦榘（酉阳）、白贞瑞（黔江）则由家人将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周尚明遗体埋葬在北门万福桥任家湾竹林下，郭翼棠遗体埋葬在青羊宫与草堂寺之间的路旁，陈选遗体埋葬在东门外青枫林（即现钢管厂职工宿舍所在地），后均湮没了。

（二）

“二·一六”惨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根源。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制造了“四·一二”惨案；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并通过清党决议；五月，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夹攻武汉国民政府；七月，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取消国共合作，与蒋介石狼狈为奸，把中国革命投入血泊之中。大革命宣告失败，从而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这时的四川，正处于“防区制”时期，军阀们一方面划分地盘各霸一方，一方面兼并争夺混战不已，形成了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巨头瓜分四川的局面。自一九二五年起即盘踞成都的刘文辉及邓、田三军阀也各划势力范围，各自择肥而噬，瓜分了成都所有大、小行政机关及兵工厂、造币厂等重要单位。他们还设置“三军联合办事处”以协调三军之间的权益。这批地方军阀，与北洋军阀早有勾结，但他们善于政治投机，当一九二六年底北伐胜利在望时，他们就易帜改向，受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图自保。大革命失败，他们又马上投靠了新军阀蒋介石。他们虽多

China

次改头换面，本质仍在乘国家多事之秋拥兵自重，尽力扩充地盘，争夺权力。二刘野心尤大，互争四川霸权。于是刘文辉则时刻伺机攻击吞并邓、田的部队和地盘来扩张自己，刘湘则乘势拉拢邓、田以孤立刘文辉。他们同蒋介石之间，也各自为着自身的权益而互存猜忌。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他们起初并未认真对待，所以“四·一二”政变在成都虽然卷起一阵白色恐怖的浪潮，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仍得以利用敌人的弱点和内部矛盾以保存自身的力量，继续开展革命运动。正如刘披云同志回忆录中所说：“成都独立支部及其所领导的各地党组织基本上没有受‘三·三一’惨案省委机关被破坏的影响……党的一般工作和日常活动仍照常进行。”成都的革命高潮并没有退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四川尤受军阀混战之苦，自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刘存厚与滇、黔军阀争夺省长开始至“二刘之战”结束，军阀混战达十七、八年，大、小战争达四百七十余次，战场遍及全川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军阀们搜括民财为军饷，抓捕农民为兵源，许多地方，荒野百里，无人耕种。当时有民谣道：“年赋十数征，税捐多如毛，兵灾加天祸，尸骨满沟壕。”

四川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在防区时期，除原有的政府杂捐九十九种和警察厅杂捐二十三种外，军阀们更巧立名目，无奇不有。如强迫农民种鸦片，按窝数收“窝捐”，不愿种的也按应有窝数收“懒捐”；女子为娼要收“妓捐”，妓女嫁人又要从重收“择配捐”和“从良执照捐”；甚至有的地方还收“过路捐”。人民除负担国税、省税、县税及国、省、县附加税外，尚有预征、垫、隔时借垫、过境军队的供应、地方团队的自筹以至下乡官兵的勒索等等，不一而足。为抽捐抽税，四川各地水、陆关卡林立，凡一切输入、输出，动辄纳税十数次至数十次。如重庆至成都仅八百余里，关卡达五十余处，贩百元之货，纳税即达约百

元；长途人力车夫的“马路捐”，由成都至灌县车资仅二元，纳捐即达一元二角。

金融货币，也是剥削手段之一。一九二五年刘、邓、田合驻成都，看到原“新厂版”五角银币的铸造有利可图，于是以邓锡侯部为主，先后在成都、崇庆、彭县、灌县、郫县等地大肆设厂仿造，成色远低于“新厂版”的七成含银量，俗呼“杂版”。军阀们见成色愈低获利益厚，竟使所铸银币含银量低至二、三成者。一时破、烂、假、哑劣币充斥市面，到一九二七年，仅成、灌两地铸造厂即达十三处，三军辖区发行量已达三千万元。于是授受争执、存放借贷纠纷所在皆是，许多地方，人们拒绝使用劣币，或折扣达五折以下者。一时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工商倒闭，失业剧增。不仅如此，军阀们还滥发各种毫无保证的票券。如重庆官银号发行兑换券一百万元，只收回七百二十元；成都官银号发行银票二百九十九万余元，仅收回二十六万余元。

如此巧取豪夺，已达敲骨吸髓程度。四川各地农业荒芜，市井萧条，人民倾家荡产，生机全无。迫使人民起而反抗，以争生存。

（三）

一九二五年中共成都特支建立以来，对宣传组织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了不懈努力，人民在党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一九二七年，中共成都市委成立。九月，面对蒋介石白色恐怖政策，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保证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又成立了中共川西特委。这时，成都的“八大赤色团体”（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成都师范大学“导社”、四川大学法政学院“共进社”、志诚法专“锐社”、四川省第一师范学校“赤锋社”、四川省第一中学“石犀社”

……）以及“成都少年俱乐部”、师大附中“新青年革命团”等革命群众社团都得到巩固和发展。它们的成员，一般已达该校学生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如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就达二百余人。党团员也有发展，如成大党员已达二十三人，团员亦有二十余人。原市工会的许多成员，也在梁华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以“工人俱乐部”的名义继续开展活动。党依靠这些革命组织作为骨干力量，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团结教育和组织工作，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自发斗争引上了革命的正轨，把成都的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一九二七年六月，成都成立“四川省成都市各界抗捐抗税大同盟”，组织各学校革命社团成员分区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发表演说，散发宣言，揭露封建军阀剥削压迫的罪行，要求裁兵裁厘，号召民众起来反抗苛捐杂税。并利用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回乡宣传，将运动发展到各县、深入到农村。接着，荣县、郫县、灌县、绵竹等许多地方的农民纷纷起来开展抗捐抗税的武装斗争。

劣币的为害，到一九二七年下年人们已忍无可忍，当时的《国民公报》曾报导说：“小民生机几乎断绝，倘再迁延不救，其危害不堪设想。”当时知名人士刘师亮曾以孙中山铜像为题作打油诗讽刺道：“铸成金刚体，顶着风雨天，捏着一把汗，谨防变铜元！”（意指军阀为铸劣币、搜光寺庙的钟、罄、佛像，下一步恐将轮到孙中山铜像了。）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由各学校革命社团出面，联合工、商、教、学各界百余团体在省一师召开了“四川反抗劣币大同盟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抗劣币大同盟”。一面派出代表向三军长请愿，一面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一月十四日，宣传队员“导社”成员何玺、刘茂、文星哲及“赤锋社”成员陈平三等被捕，接着，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又发出《禁止鼓动反劣币风潮和擅发标语传单》的

布告。一时群情激愤，罢工、罢课、罢市席卷全城。后来，反动当局迫于群众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并表面答应群众要求，采取了以下敷衍措施：一、派向育仁率领军队往川西五县巡行一周，做出要捣毁私厂的姿态；二、宣布劣币不再“一律使用”，承认了业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三、在全城设银币鉴定兑换所五处，每日用五万钏铜元以每元五千六百文价格兑换劣币。但又规定每人每日只能兑换两个五角银币，这在五十万人口的成都，每天平均五户才能兑换一元，按发行量三千万元计算，要五年才能兑换完。这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成都人民，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兑换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和暴行，却使成都人民更增加了不少苦难和生命财产的损失。

一九二七年下年，由于作为省立各校经费来源的肉税被军阀截留挪用，使原本有余的三十万元教育经费变成年年亏缺。学校无力购置教学设备，连教职员工资也或拖欠至一年以上，或大打折扣有至二折者，甚至发给不能兑现的“欠薪证”。为此，教师奔走呼号，要求“续命”，但无人置理。有的学校无力开学，有的行课至十二三周即告放假，使学生流浪街头。十一月，成都教职员联合会提出要求发给一个半月薪金以维持生活，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因与教厅交涉无效，乃宣布于二十八日起实行总罢教，开展索薪运动。中共川西特委领导下的党、团组织发动公立各校学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实行总罢课，声援教职员工的正义斗争，并成立了领导机构“成都学生联合会”。十二月三日，“四川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成都各界后援会”成立，发表宣言表示坚决支持教育经费独立。各私立学校也发表了《援助教育经费独立宣言》。各校校长团并一再向伪教厅提出“集体辞职”，“以促肉税之早日归还”。这一运动，在重庆、自贡、郫县、岳池、中江、广汉、什邡、南部、富顺等全川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重庆亦筹办学生联合会以领导这场斗争。这个运动在省外也获得同情和支持，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